

源道

第一卷



周发源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源道

第一卷



周发源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道：全4册 / 周发源著.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81128-330-3

I. ①源… II. ①周…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2812号

YUANDAO

源 道

周发源 著

责任编辑：吕 花

装帧设计：李时春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0731-58298966 邮编：411105

网 址：<http://press.xtu.edu.cn>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70.75

字 数：871千字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8-330-3

定 价：169.00元(全书共四卷)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前 言

一个人呱呱问世来到人间，时间是绵延不断的，如果把一年作为“逗号”，那么若干“逗号”便构成人的一生。但这样似乎不够科学，因为作为个体的人的一生中，总有某些年份更重要，在生命的轨迹中留下的痕迹更深、影响更大，成为人生的“节点”，相比其他年份而言，用“分号”“问号”“感叹号”等表示应该更准确。我从事文字写作三十多年，作品既有抒情叙事的，也有分析说理的，既有个人独撰的，也有合作共著的，至2015年印刷出版的文字约有几百万字。这些文字好坏优劣客观存在，功过是非由人评说，但都是当时的所思所想所见所感。俗话说，敝帚自珍，在朋友们的鼓励支持下，选取其中部分文稿汇编成册，既有回眸总结过去之意，也是放下再启未来之想。诚如哲人所言：老年思既往，少年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出这套书，就是想把“留恋”固化，把“希望”续起。

文章千古事。中华传统的优点之一是崇读、崇思、崇写。文化人、“笔杆子”是受人敬重的。“耕读持家”源远流长，述而不作总有遗憾。也许是受这种文化传统的熏染，我虽不是出身诗书世家，正规上学也少，但从小对读书写作却分外喜爱。

读古今中外经典名著，虽囫圇吞枣、一知半解，但如饥似渴、兴味盎然，为书中的人物、故事、情感、哲理、文采、方法所折服，经常摘录、背诵、模仿名家的文字，幻想成为诗人、作家，写下了一些稚嫩而充满梦想的诗歌和文章。至今清晰地记得，当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黄狮寨看日出》在《旅游天地》面世时，那种激动的心情和欢呼雀跃的情景。“记得当年骑竹马，看看又是白头翁”，回首往事，真切地体会到梦想比金钱地位更重要。当人具有梦想并为之奋斗时，当向梦想迈进哪怕是一分一寸时，那是何等的幸福！缘于此，在选编文章时，虽然尽量减少篇幅，但还是把年轻时写的几篇未发表的文章留下，就是想记住历史、记住梦想、记住青春、记住激情。

1985年，我考上了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理论班，开启了理论学习和研究的航程，思维方式也逐渐从注重形象情感向注重抽象理性转变，对理论问题的兴趣日趋浓厚。理论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就像巨型磁石，我不由自主地被它吸引。从马克思主义的伟作到资产阶级学者的名著，从文史哲到经政管各种经典，真理的力量激起了我如饥似渴的阅读欲、求知欲。与各方面“高人”对话后醍醐灌顶的愉悦感，引发了我强烈的问题意识、真理意识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思维习惯。回想当年与老师、同学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各种讨论、辩论、争论，那种胸怀坦荡、意气风发、唯真唯实的学术氛围，引发了多少思想的漪澜。那两年，我陆续写了几篇习作，毕业论文《十七年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历史反思》在文汇报社主办的《理论探讨》刊发，获得常德地区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缺）。成功的激励是巨大的，从那时起，我对官僚

主义的研究时断时续，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写出了学术著作的提纲和初稿，终于完成专著《直击官僚主义》，201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章合为时而著”。论文是时代的产物，也必然留下时代的痕迹。风云际会的改革开放大潮，持续快速的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急风骤雨的社会转型，纷繁复杂的观念碰撞，为思考者提供了丰富养料和宽广平台。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的方针政策是怎样形成的？这就不能不研究中共几代领导集体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轨迹和特征。1995年，我执笔撰写了《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基本特征》一文，在《求是》杂志刊发后引起热议，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评选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此后，我围绕邓小平决策思想主题开展了多方面多视角的研究，发表了十多篇论文，最后形成专著《邓小平决策思想研究》，1999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回头来看，1985年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后所写的理论文章，大多是围绕着当时的大问题大事件展开的，留下了或深或浅的时代痕迹和作者的探索思考。

理论在实践中升华。理论既要好听可信，还要好用管用。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品格之一。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决策是时代对学人的呼唤。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工作岗位需要，也是受湖湘学人传统影响，开展实地调研、解决现实问题成为我研究的主要方向。主持和参与重要课题研究几十项，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选择热点难点、紧扣实际实践、深入探讨分析、提出政策建议成为调查研究和撰写报告的基本思路。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以前的研究主要是沉

浸在书本里的思考，那么，这一时期更多的是求教于大地和群众。理论是经验的总结，包括总结正确与错误、历史与现实、他人与自己的经验，这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2005年，全国各地纷纷取消农业税，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大变革，对农村经济社会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免去“皇粮国税”后农村如何改革发展？我主持了“取消农业税后农村改革问题研究”课题，主编了《新农村之路丛书》，分析回答了当时农村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受到国家和省领导的重视并影响决策。国务院领导和中共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多位领导做出肯定批示，并安排课题组成员直接参与指导湖南农村改革试点——沅江市的改革试点工作。人民日报社《内部参阅》《湖南社会科学》等媒体予以推介。2008年，针对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中党的建设相对滞后的现状，我主持了“民营企业党的建设问题研究”课题，撰写的以《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民企”这个阵地上》为主体的系列调研报告，分析回答了当时民营企业党的建设若干问题，受到中央领导、中央组织部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重视，他们分别做出肯定批示，对推进民营企业党建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求是》、人民日报社《内部参阅》《党建研究内参》等媒体对课题成果予以推介。

2009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任命我担任湖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这就必须对如何推动全省社科事业繁荣发展进行思考和谋划。思考形成观念，观念引领行动，讲话则是传导思想观念的重要方式。在这六年多主持工作的过程中，我在不同场合，对不同问题、不同人群讲了许多话，其中既有“普通话”，也有“专业话”；既有上级精神，也有个人心得；既有虚，也有

实；既有宏观的，也有具体的；既有对事的，也有对人的。我时时告诫自己：要“多讲真话，少讲空话，不讲假话”，努力讲少、讲好、讲新、讲管用的，但限于种种原因，难免存在冗长、重复和老套的情况。况且工作就是那些，思路做法大同小异，“常说常新、常做常新”往往说易做难。把部分讲稿汇编成册，只是记下所思所说所做，保留历史，记住“曾经”。为了避免重复呆板，节约篇幅文字，对原稿做了一些删减整理。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长期从事社科理论工作，经常与学者打交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生活常态。以文会友、以学交友是常情，座谈交流、笔谈交锋是常事，在“会”与“谈”的过程中，有赞赏、有沟通、有争论、有质疑、有发现，也有“顿悟”，欲吐后快，便形成了随笔、书评、序言、短论等文字，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多领域，碰触学问、学风、学人、学术诸多方面，长短随意，有感而发，文短情长，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故事和情感，让人“不需要想起，也不会忘记”。几十年来社科界和社科联机关许多朋友真诚无私的关心、关爱和帮助，永驻我心中。

甲子一轮回。耳顺之年是人生中的重要节点。当我离开湖南省社科联主要领导岗位之后，便来个“秋后算账”，把留下的文字汇编成书，记下走过的路、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发过的文，取名《源道》。第一卷是理论文章，从100多篇已刊发的文章中选取26篇，约23万字；第二卷是调研报告，从近30个调研报告中选取10个，约24万字；第三卷是讲话发言，从200多次讲话发言中选取42篇，有些重复的还做了删减合并，约20万字；第四卷是随笔短文，包括散文、随笔、书评、书

序、短论等共72篇，约19万字。这样选编，是为了减少篇幅，便于阅读；也是为了记下“可记”的文字，鞭策自己。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不管岗位、年龄如何变化，只要一息尚存，就应有所追求、有所奉献、有所作为，为国家、为人民、为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位86岁的老领导、老专家告诉我，他退休后独著、主编、参编著作几十部，真是厚积薄发、雄才老成。我愿向他们学习，以甲子轮回为新起点，发挥老的优势，学不止、思不怠、研不懈、写不停，不负“第二春”。

感谢汤建军、刘平、陈远、黄云志、黄渊基、章敏、彭培根、李建国、王泽应等同志对编辑本书付出的辛劳，感谢章育良、吕花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感谢席志强同志题写书名，感谢多年来教诲、帮助、支持我的领导、师长、同事、同学、朋友和同志，感谢我的亲人长期的支持、鼓励和鞭策。尤其要感谢妻子彭慧和女儿周觅，她们长期默默付出，承担了繁杂琐碎的家务，给予我工作上的支持，赋予我家庭的温暖温馨，特别是女婿周琳凯和小外孙周又周的到来，使亲情更加快乐、浓郁和持久。常言道，人生有“一得”足矣，何况我还收获了这样多的亲情和友情？一棵树成长的年轮里，一定积淀着阳光雨露和土壤水肥的养分。我愿是一棵树，根在大地，心向蓝天，不负养分，回报绿蕴。

周发源

2016年6月于三敬斋

目 录

十七年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历史反思	(1)
论官僚主义存在的原因	(14)
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兼驳党的领导的合法性需要“重新认定”	(27)
官僚主义起源再思考	(36)
四十年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回顾与思考	(45)
列宁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初探	(61)
论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基本特征	(71)
论邓小平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82)
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	
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创造性运用	(93)
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学习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启示	(114)

决策必须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邓小平决策思想简论 (125)

善于总结经验 实现正确决策

——邓小平决策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135)

邓小平面向现代化决策的主要内容和鲜明特色 (144)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 (156)

学习邓小平着眼大局 面向未来的决策思想 (16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四大特征 (170)

20 年邓小平领导艺术研究综述 (185)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品质 (198)

培养接班人是邓小平的重大历史贡献 (206)

论邓小平反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217)

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局限及启示 (234)

和谐社会与和谐意识 (250)

新农村建设要做好五项工作 处理好三个关系 (258)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科学化 (262)

科学发展观的“三个统一” (273)

官僚主义的内涵、源流、形态与防治研究

——以社会分工为视角 (278)

后记 (313)

十七年反官僚主义斗争的 历史反思^{*}

摘 要：十七年反官僚主义斗争分为 1950 年 4 月—1957 年 4 月和 1957 年 5 月—1966 年 5 月两个阶段，在斗争过程中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存在对官僚主义的根源、性质认识不清，斗争方式简单粗暴等主要教训。

关键词：十七年；反官僚主义；经验；教训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党领导了长期不懈的反官僚主义斗争。这十七年的理论和实践，既有成功经验，又有深刻教训。认真研究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和今后更好地与官僚主义做斗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十七年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 年 4 月—1957 年 4 月。这一阶段，党的思

^{*}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社《理论探讨》1987 年第 3 期，被评为常德地区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保证了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顺利开展，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发出了警惕和防止官僚主义的号召。夺得全国政权后，针对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一新的历史条件和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现象，党中央敏锐地察觉到官僚主义在新政权内部“复活”的危险性和它的严重危害，及时开展了“整风”“整党”“三反”等一系列运动，与官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希望通过这几次运动把它消灭。然而，这些运动，特别是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虽然在反贪污、反浪费方面取得了很大胜利，对官僚主义也有所克服，但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各种官僚主义现象依然顽固地存在。这时，党开始认识到与官僚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在“新三反”（即1953年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运动中不单独反对官僚主义，而是把它与日常工作相结合，在日常工作中与之做韧性斗争。从此，这一认识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始终占主导地位，并通过党的“八大”对此作了总结，使反官僚主义斗争一直比较健康地发展，虽然其间也有失误（如1956年合作化时），但成绩是主要的，即使在1957年4月“整风”运动开始时，中央还是明文规定“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要“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1]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要搞粗暴斗争。只是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干扰了这一斗争的正常进行，才使预期的目的没有达到。

第二阶段，1957年5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影响了反官僚主义斗争的进程。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的不正常

政治生活和1958年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全国出现了以“高指标”“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强迫命令、压制民主、家长作风在各级机关和广大干部身上突出表现出来。这不仅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巨大困难，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于是，党中央决定在纠正经济建设错误的同时，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争取党风的好转。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多次严厉地批评了当时正在发展的官僚主义，亲自为中央起草了许多文件批示，希望通过年年整风来彻底解决这种“死官僚主义”。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他针对当时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情况，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带头深入基层。以后他又反复强调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党中央为此连续发动“三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农村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整风整社”“社教”“四清”等一系列运动，采取了种种具体措施，以极大的精力与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和措施不乏成功之处（如精简机构），但是，由于当时党的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发展，由于对官僚主义的性质及其产生根源认识不清，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被染上了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有效地与官僚主义做斗争。恰恰相反，官僚主义不仅没被消灭，甚至还愈演愈烈，有时竟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可见，十七年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前七年比较成功。虽然这七年中也犯过错误，对官僚主义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但总的看来，其认识是由浅入深不断发展的，采取的措施有许

多是可取的，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这对于今天反官僚主义斗争，是可以借鉴的。后十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严重影响了对官僚主义的认识及其斗争。相对而言，成功经验较少，教训尤为深刻。因此，我们总结经验，主要是指前七年的经验（其中有的也是后十年的经验），而且也只能就最主要的谈谈罢了。

有哪些成功经验呢？

第一，与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在各项具体工作中与官僚主义做斗争。“新三反”中，《人民日报》发表的《密切结合当前各项工作，坚决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社论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表现在各项具体工作上的，离开了对各项工作的具体检查，就无从发现和纠正官僚主义；如果离开了当前的重要工作……去孤立进行什么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不仅是发现不了因而打击不到官僚主义的要害，而且还会因为放弃了或者放松了当前工作，给国家人民带来更大损失。”^[2]这一思想在全国各条战线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得到普遍贯彻，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在农村中，就是与春耕夏播紧密结合，并通过检查春耕夏播的工作来进行的。1953年《人民日报》专题报道了山东省在这方面的经验。

第二，上下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检查官僚主义，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官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它主要表现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身上。列宁曾经指出，克服官僚主义的最好

办法是“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和广泛监督管理机关”^[3]，将干部和领导机关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反右斗争前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如1950年的“整风”运动，1952年的“三反”运动，都是先由领导主动检查，发动下级和群众给领导和领导机关提意见，由下级机关检查上级机关的工作，又由上级机关检查下级机关的工作，上下级之间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一系列步骤进行的。特别是通过报纸对典型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公开批评，通过检查群众来信等方式，对领导者和领导机关实行严格监督，对克服官僚主义起了较大作用。

第三，从严治党，严肃党纪法纪，对官僚主义者进行严肃处理。我们党是执政党，党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官僚主义错误，虽然非党干部也有，但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党员干部身上。所以，列宁曾提出要“加重法庭对共产党员的判罪”，“对共产党员应比对非党人员三倍严厉地惩办”^[4]。这一点我们党是做得比较成功的。1952年“三反”运动前，共处理了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48189人，其中犯官僚主义、渎职的有3936人。在“三反”运动中，仅华北、华东、西南、西北四个大区中，就处理了县级以上干部4029人，其中省级干部25人，地级干部576人。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与此同时，我们对民主人士则比较宽容，在“新三反”运动中，中央曾明文规定，反官僚主义一般不涉及民主人士，这就使全社会看到了我们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正是从严治党，使官僚主义者有所收敛，使党的威信大大提高，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从上面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中可以看出，十七年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打击和抑制了官僚主义，表明了我们党与官僚主义斗争的巨大勇气和决心。但是，为什么运动和斗争一直持续不断，而“收效甚微”呢？为什么官僚主义不仅没有被克服，反而屡革屡兴，在某些地方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呢？这不仅说明中国存在着官僚主义赖以寄生的深厚土壤，而且说明这些运动和斗争自身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问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总结这些教训，作为现在和今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前车之鉴，是非常必要的。

十七年反官僚主义的教训

第一，对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认识片面，始终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是我们不能与官僚主义做有效斗争的根本原因。

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风”运动和“三反”运动，认为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仅仅是旧社会的遗留和影响。这种遗留和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旧的工作人员没有得到改造；二是革命队伍中的干部受了旧思想、旧作风的影响。而对产生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体制根源以及文化思想根源没有涉及。“新三反”时，已认识到官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有它长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经济基础，绝不是在任何一次打击下就会消失的，并提出了与官僚主义做长期斗争的口号。在当时条件下，能对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做出这样的分析判断，是难能可贵的，它比前几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对以后的斗争产生了较好